

Lunyu (論語) Should Be Lunyu (侖語): Rectification for the Confucian Classic Having Been Passed Down for 2,000 Years

Asano Yuichi

Abstract: About the title of Analects, Japanese Sinologist Takeuchi Yoshio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 his book *Rongo no Kenkyu* (Research on the Analects). He concluded that neither the “twenty-two-chapter Qi version” nor the “twenty-chapter Lu version” appeared in early Han Dynasty. Also, the school that taught Analects did not exist at that time. The text of the handed-down Anal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derive from the old version of twenty-one chapters found in the walls of Confucius’s old residence.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Han: Yiwenzhi*, the Analects originated as individual records kept by Confucius’s disciple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Master and them, which were then collected and jointly edited by the disciples after Confucius’ death. However, in view of the repetitiveness of a certain amount of dialogues in Analects,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being edited and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deep and rigorous discussion.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Book of Han: Yiwenzhi*, therefore, was not correct.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Qin-Han Dynasty, the old text and new text differ greatly in many aspects. Based on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excavated since the 1990s, we can see that although the character lun had the component of 言 yan in the old text version of Analects, it’s hard to assume the same in the new text version, in that whether the components attached or not, the position of the component or even the categories of the component have not been settled down yet. Some characters had the component of 言 yan in old text; while appeared without it in new text. The present Analects wa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ddress of Confucius, such as Zi (子), Fuzi (夫子), Zhongni (仲尼) and Kongzi (孔子). Besides, there are ten pieces of Confucian texts in Guodian Chu bamboo slips, while seventeen pieces in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s of Chu Documents. They overlap only in the contents of Ziyi (緇衣) and Xing Qing Lun (性自命出), suggesting that the Analects was circulated in single piece, instead of the settled form consisting of ten pieces or twenty pieces at that time. All in all, considering the above mentioned forming process of the Analects, the title should be Lunyu (侖語) instead of Lunyu (論語), which mean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r even third generation of disciples of Confucius collected the bamboo slips filled with the dialogues between Confucius and disciples. Lun (侖) is made from the component of ji (厶) and ce (冊), while ji (厶) means collecting and ce (冊) means compiling the bamboo slips with strings, making the Lun (侖) mean collecting and editing the bamboo slips in order as a whole.

Keywords: Lunyu (論語); rectification of name; primitive meaning

Author: Aasano Yuichi, graduated in 1971 from Faculty of Arts and Letters, Tohoku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1976 he completed PhD program without a PhD degree in the same department, Tohoku University. He successively held the posts of lectur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himane University, then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Tohoku University until retired in 2009. His main works include *Kōrōdō no seiritsu to tenkai* (Comple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ang-Lao-dao); *Kōshishinwa: shūkyō to shite no Jukyō no keisei* (Myth of Confucius: the 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as Religion); *Shoshihyakka: Shunjū, Sengoku o ikitajōnetsu to kōsōryoku* (Hundreds of Various Schools: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on in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Period); *KodaiChūgoku no gengtetsugaku*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Ancient China); *KodaiChūgoku no bunmeikan: juka, bokka, dōka no ronsō* (Views on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Debate among Confucianism, Mohism and Daoism); *ZhanguoChujianyanjiu* (Research on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ShangboChujianyuxianqinsixiang* (Bamboo Slips of Shanghai Museum and Pre-Qin Intellectual History), etc.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淺野裕一



[摘要]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鑒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

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19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祇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搜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纔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意思是：收集竹簡並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論語》 正名 本意

[作者簡介]淺野裕一（あさの 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觀——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註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裏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註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註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 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檢視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祇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祇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鑒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祇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纔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裏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纔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裏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祇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篇）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崑山以東的舊

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文書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布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祇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搜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①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②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

① “古文”文本的發現，引起了古今兩種文本孰優孰劣的爭論。雖然《孝經》遭秦始皇的焚書化為灰燼，但河間人顏芝匿藏了一部免於焚毀，並於漢初由顏芝之子顏貞上獻朝廷。此書乃分為十八章的“今文”文本。之後，又從孔子舊宅壁中發現“古文”《孝經》。將其與“今文”《孝經》比較，其中含有“今文”文本未錄的“閨門章”，“今文”中的“庶人章”被分割為“庶人”與“孝平”兩章；“聖治章”被分割成“聖治”“父母生績”“孝優劣”三章。由此出現“古文”“今文”孰優孰劣之論。兩者最為激烈的爭論，是圍繞《春秋》的對立。為闡明孔子以“春秋筆法”寓於《春秋經》中之正義，出現了三種註釋。其中，《公羊傳》與《穀梁傳》至漢初均以口相傳；漢景帝以後，將之“今文”文字化，稱為今文系之傳。《左氏傳》乃前漢末期劉歆在宮中祕府發現後開始流傳於世，故稱為古文系之傳。此外，在解釋《春秋》經之際，依照今文系之傳抑或古文系之傳的爭論蔓延至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等，更持續至清末公羊學派之《左傳》偽作說。雖然古今文之爭乃思想史一大問題，而爭論本身卻一直缺乏關鍵的“古文”資料。

② 有關郭店楚簡的詳細資料，參看[日]淺野裕一編：《古代思想史と郭店楚簡》（東京：汲古書院，2005）。

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①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繫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②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祇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資料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冡→家、魂→鬼、捰→爭、滌→早、累→明、來→來、壘→夷、宍→屯、牘→資、牝→因、宐→主、迓→升、割→宰、审→中、罰→刑、虔→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厶→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祥、夨→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纒→連、倉→答、系司→始、复→作、遯→徒、馱→聞/問、戡→識、雙→發、眚→性/姓、復→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蕙→漫、笔→席、衍→道、虐→吾、忒→願、邛→趙、譏→通、避→失、煮→圖、女→焉等，兩者之間字體元素截然不同之亦極多。總之，若以“今文”的字體作基準，“古文”的文字結構元素尚未固定。

在戰國時代，君主、中央政府為推動官僚組織而進行文書往來時，如果在文字使用方法上不謀求一定程度的統一，恐造成文書的發件人和收件人之間在溝通上的困難。如果任文字在民間被隨意使用，亦可能導致由形、音、義三個方向派生所謂假借字、異體字、別體字等狀況，最終難免不斷擴散之宿命。

能夠阻止這種情況並實行文字統一者，唯有國家權力。唯有中央政府以統治為由強制統一使用文字，方可勉強防止文字使用的混亂。由此推測，戰國時期各國亦曾實施一定程度的文字統一政策。而上海博物館所購得的名為《字析》之字書，可視作楚國中央政府為了向地方行政機關顯示文字的標準體，以國庫支出製作並分發的規範本。^③

儘管如此，統一文字畢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程。以標準字體作為全國性統一規範文字的目標，直至漢代後期楷書體的出現纔得以實現。因此，在“古文”範圍裏的用法也會有相當的搖擺。更何況，經過秦始皇徹底統一文字後的“今文”，與以往“古文”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④

根據以上論述以及戰國竹簡的發現而漸趨明朗的“古文”實態來看，單以記錄“古論語”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並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的“論”字。如上所述，在“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如，論→治、慇/訶→始、說→悅，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考慮到

① 有關上博楚簡的詳細資料，參看[日]湯淺邦弘編：《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日]淺野裕一編《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国思想（一）——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国思想（二）——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8）、《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国思想（三）——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0）等。

② 有關清華簡，參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日]湯淺邦弘：“清華大學竹簡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國研究集刊》50（2010）；[日]小澤賢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考”，《中國天文學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0）。

③ 《字析》的內容雖尚未公開。據傳，此乃由楚國編纂而成的包含部首的大部頭字書。有關研究，可參看[日]福田哲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字書’に関する情報”，《中國研究集刊》43（2006）；戰國楚簡研究會：“中國西安、上海學術調查報告”，《中國研究集刊》43（2007），別冊。

④ 相對於用“古文”記載的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清華簡等戰國時期出土文獻，雲夢秦簡、嶽麓書院秦簡、北京大學秦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北京大學漢簡等秦漢的出土文獻皆為“今文”。這一現象證實了，由秦始皇實行的文字統一以及強制使用隸書的徹底程度。此外，有關新出土文獻所帶來“古文”的新認識，可參看[日]福田哲之：《文字の発見が歴史をゆるがす——20世紀中国出土文字資料の証言》（東京：二玄社，2003）。

上述《論語》的內容和形成過程，《論語》的書名應該叫《命語》纔對。所謂“命”（命），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亼”的意思是收集，“冊”表示竹簡用繩編綴之形態。合起來的意思是：收集竹簡並按順序編輯。

武內義雄的《論語之研究》推斷，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河間七篇本、齊論語七篇、齊魯二篇本，以及後人收集所得《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問》《子罕》五篇等組成。姑且不論此推斷正確與否，《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是毋庸置疑之事實。無論是河間七篇本，還是齊論語七篇，由戰國時期書籍均以篇幅為單位流傳觀之，可以推測《論語》本身是各種資料的合輯本。尤其是在孔子的稱呼上缺乏統一性，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

從已公佈的郭店楚簡中可以看到，儒家文獻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十種。而在上博楚簡中，已發現的儒家文獻有《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性自命出）》^①《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徒政》《昔者君老》《周易》《仲弓》《內禮》《相邦之道》《季康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天子建州》十七種。其中，雙方共通的祇有《緇衣》和《性自命出》。此一現象說明，當時並非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而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的。

在上博楚簡中，也內含大量收錄於《論語》的語錄，如《弟子問》《君子為禮》《季康子問於孔子》《孔子見季桓子》等孔子與門人及魯貴族等的對話。此一現象說明，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曾有大量孔子語錄。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搜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之為《命語》的可能性極大。因此，拋棄《漢書·藝文志》就“論”字做牽強附會之論，其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重複之處等問題就可自然消解。

自漢昭帝至漢宣帝時期，《論語》書名基本穩定之後，兩千年來，還未曾有過質疑。《荀子·正名》言：“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指出名稱並不存在正確與否，正名的關鍵在於是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

《論語》此名稱已被沿用了兩千年，已經完全習俗化，作為約定而根深蒂固。雖然拙文遵循“必也正名乎”之言，闡述了《論語》的“論”實為“命”而非“論”，但如今並沒有改變書名的必要，這裏還須以“守名約”（《荀子·正名》）為重。

[編者註：該文原係作者向“首屆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應編者之邀，又對相關內容作了修訂和補充，由香港城市大學胡欣欣翻譯，談仁校訂。]

^① 上博楚簡的《性情論》雖與郭店楚簡的《性自命出》實為同一文獻，但上海博物館將其命名為《性情論》。有關兩者的關係，參見[日]竹田健二：“郭店楚簡《性自命出》と上海博物館藏《性情論》との關係”，《日本中國學會報》55（2003）。